

矢志永远奋斗 记忆(上)

中国共产党的全部历史都是从中共一大开启——

走得再远都不能忘记来时的路

回顾光辉历程
汲取奋进力量

邵岭

1921年7月，如同一记砸向旧世界的锤头，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向世界宣告成立。从当年上海望志路石库门建筑里一间18平方米的房间，到浙江嘉兴南湖上的红船，年轻的政党出发，启航，引领了跨世纪的航程。在那个风雨如磐的年代，她手握真理，浴血奋斗，把人民对新中国的憧憬与理想变成现实，实现了中国历史上的开天辟地，锻造出中华民族驶向复兴彼岸的航迹。

没有共产党，就没有新中国。从一大到十九大，从一大召开时的全国50多名党员到如今8900多万名党员。信仰始终是我们高扬的旗帜，也如同血脉，融入每一个共产党员的肌体。今天，站在新时代的门口，在走向“两个一百年”的重要历史节点，我们回首过去，回顾党的光辉历程特别是建党时的历史，为的是学习革命先辈的崇高精神，不忘初心、牢记使命，不忘初心、砥砺前行。

■本报记者 刘力源

从石库门到天安门，中国共产党走过光辉历程。党在上海诞生，这一历史选择看似偶然，但蕴含着一种必然。兴业路76号，隔壁就是喧嚣的新天地。上海的热闹，这一带最为明显。

而96年前，这里静得很。当时，沿望志路（今兴业路）只建了一排五幢一上一下的石库门房屋，房屋簇新，马路对面是一片菜地，菜地旁仅有一所庙堂，沿马路西边的房屋也没有建造，仅有一些平房和几家小手工业工场。

1921年7月23日，平均年龄28岁的十余位代表从各地而来，与两位共产国际代表走入望志路上的106号（今兴业路76号），之后的故事家喻户晓。

而后，直至1933年转移到江西瑞金，中共中央与上海结缘12年，其间虽有短暂迁移，最终又回到了上海。这12年，从中共一大到中共四大（除三大在广州召开），构成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完整过程、开启了大革命的新高潮。

回到起点，回到这幢保留着上世纪20年代风貌的老宅，一个个问号被点亮——为何是这里？为何是上海？为何是城市？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，这一历史选择究竟蕴含着怎样的必然性？

特殊的城市提供特殊环境

无论是政治环境、社会环境还是交通通信，上海都有其他城市不具备的比较优势

“一个会议在某一个地方举行，具有很大的偶然性。但是，考虑到那时上海特殊的政治格局与特定的区域功能，像中共一大这样的会议在上海、在法租界举行，



中共一大代表群像浮雕。

图/东方IC

还是有某种必然性的。”学者熊月之认为，无论是政治环境、社会环境还是交通通信，对一个全国性的、国际联系频繁的政党的成立及发展，上海都有其他城市不具备的比较优势。

熊月之将当时的上海概括为“一市三治”——法租界、公共租界和华界，管辖区域、管辖权及司法系统等都是各自独立的——这就跟单一性的城市有所区别：“单一性城市在行政管理上有其有效性，而当时的上海管理边际效益比较低，相对来说，从事党的工作就有比较大的安全性。再加上制度差异，客观上为党的革命活动提供了便利。”

尽管有“南陈北李”相约建党之说，但是在当时，仅从政治环境来看，作为北洋政府所在地的北京远不如上海宽松。五四运动以后北京气氛压抑，文化环境恶劣。先是北大校长蔡元培秘密离京，后是陈独秀被捕，再是《新青年》编辑部南迁，1921年又发生军警殴打北大教授事件，导致北方文化人纷纷南下，这期间很多政治精英、文化精英选择了上海，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陈独秀是其中之一。

从国外回来的知识分子、政治精英，很多选择居住在法租界。熊月之梳理了1919年至1921年，宣传社会主义、马克思主义，参与或推动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知识分子的住处：“都在法租界，而且相距不远。中共一大的选址一定程度上是因为陈独秀、李汉俊、李达就居住在附近。”选择居住法租界，而非公共租界，是与前者的发展有关。法租界重文化，工商业不如公共租界发达，税收相对较少，建设较慢。1914年对于法租界来说是个发展的界线——之前法租界只有2000多亩，租界中心是金陵东路；1914年法租界向今鲁班路以西的地方扩展，一直延伸到肇嘉浜路以北、徐家汇一带，面积一下增至15000多亩，中共一大地址（房屋建于1920年）所在的区域1914年后才发展起来，属于法租界的边缘地带，相对僻静，当时一大批知识分子和激进人士，包括孙中山、陈独秀等都在这一带居住，原因在于这一带房子较便宜，房价大概是金陵东路等市中心的五分之一，又临近租界交界处，方便组织活动，而且法租界的集权管理模式相比公共租界效率不高。另一方面，相

对集权的管理模式也使得法租界成为上海实行城市规划最好的区域，从道路系统到房屋建造都有标准，法租界的品位与宜居在当时的上海比较突出，这也是很多国外回来的知识分子选择此处落脚的原因。

1927年“四一二”反革命政变发生后，中国共产党在上海面临的危险严重加大，上海临近南京国民政府，蒋介石南京政府又把主要的精力用于对付中国共产党，整个环境不利于中国共产党在上海领导工人运动；与此同时，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在农村开辟了一个天地，意味着党的活动、工作重心发生变化，由城市转移到农村。1933年，中共中央决定撤出上海，迁至江西瑞金。

全国化的上海有独特优势

城市性格决定了城市居民的性格；文化性格使得上海具有非常强的包容度

中共一大的代表来自全国各地，在上海，他们便于隐藏身份，这是很多城市不具备的优势。“上海外国人多，外地人少，这是很要紧的。如果是在一个外地人很少的地方，一大代表的外地口音会被马上听出来，但是在上海这很正常，当时的上海85%的人都是各地而来，可谓‘南腔北调’。”熊月之说，1860年以后，当时的上海可以免受战火波及，相对安全。再加上城市大，容易解决就业问题，因此国内尤其是江南一带一旦发生战争、灾荒，人们会逃向上海。“上海的第一波人口及财富就来自江南，尤其是太平天国时期，江南的富户为上海带来了资金，穷人带来了廉价劳动力。1921年，上海已经有240万人口，远远超过其他城市，是当时的特大城市。在一个移民城市里，中共一大代表的到来不会显得突兀。”

中国共产党的建立，得到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的帮助。在上海开会，跟共产国际也有关系。“当时整个欧洲严重打压共产主义，马林、魏金斯基（中文名吴廷康）等

人熟悉欧洲的政治环境，他们对中国的情况又不太熟，所以警惕性特别高。中共一大开会期间，闯入了巡捕，马林等人尤其紧张。”而1920年的上海有大约5000名俄侨，主要生活在法租界，他们中有一些人拥护布尔什维克。这为马林、魏金斯基等人在上海的活动，提供了很大的方便，无形中起了掩护作用。

熊月之认为，当时没有哪一个城市像上海那么信息发达，可以跟国际上任何大的城市有通信往来，交通上跟欧美、日本及南洋都有轮船航线，面向国内还有内河航线。清末铁路的发展，更使上海成为交通和信息通信的枢纽。上海当时又有全国最多的报纸、电台等媒体，甚至连弄堂里都有电台——世界上出了什么消息，第二天上海就知道了。

上海较高的国际化程度还表现在，许多新发明、新产品如电话、电灯、汽车在上海的使用跟西方大城市几乎同步，这与侨居在此的西方人有一定关系，当时在上海安家置业的西方人少则三四万，多的时候有八九万，其中很多人都自称“上海人”，他们使用一些新式物品对中国人的示范效应非常强，而上海对这些先进的东西接受得也非常快。

有学者认为，城市性格决定了城市居民的性格，上海对西方新事物的接受度高于全国其他城市。当现代科技大潮席卷而来时，西方的现代元素传至国内，上海是一个最好的载体。作为上世纪三十、四十年代最国际化的城市，上海在西方商品经济的冲击下，打破了社会原有的等级差别、文化差别——西方的观念、文化与本地文化交融，形成“平台文化”，这种文化性格使得上海具有非常强的包容度。同时，上海的商业程度高，成熟的商业社会，法治程度往往也很高，两者作用下还能够产生较高的生产效率，因此工厂集聚。“当时的上海可谓机会遍地、出版业也非常发达，人人都看报纸从中寻找机会。这种生活方式与留学生留学的国家极为相似，因此很多人留学回国后就住在这里聚集。他们把外国的方式拿来中国实行，尽管方式可能不同。”

▼ 下转第七版

